



# CEO 组织认同与税收规避

周美华<sup>1</sup>, 兰明慧<sup>2</sup>, 林斌<sup>3</sup>

1 江西财经大学 会计学院, 南昌 330013

2 中央财经大学 商学院, 北京 100081

3 中山大学 管理学院, 广州 510275

**摘要:** 高管作为企业决策的直接制定者和执行者, 其心理特征对企业行为产生重要的影响。已有研究发现, 高管个人对企业的税收规避决策产生重要的影响。CEO 在做出税收规避决策时需要考虑其收益和成本, 对企业认同感不同的CEO 在考虑收益和成本时存在较大的差异, 进而导致不同的税收规避政策。

以税收规避的收益和成本理论以及代理理论为基础, 利用 2014 年中国上市企业调查问卷的组织认同数据, 采用名义所得税率与实际所得税率的差值测量税收规避, 选择 2013 年至 2015 年中国沪深两市 5209 个企业的观测值作为研究样本, 采用最小二乘回归方法, 探讨 CEO 组织认同与税收规避的关系, 并按企业内部的信息透明度和外部的税收征管力度进行分组, 深入分析不同情景下 CEO 组织认同与税收规避之间的关系。

研究结果表明, CEO 组织认同与税收规避显著负相关, 即 CEO 组织认同越高, 税收规避越少。在信息透明度较高和税收征管力度较弱的企业中, CEO 组织认同与税收规避显著负相关。进一步研究 CFO 组织认同对税收规避的影响, 发现 CFO 组织认同与税收规避负相关, 但不显著, 并且不影响 CEO 组织认同与税收规避之间的关系。稳健性检验中, 使用有效税率替代税收规避, 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构建 CEO 组织认同, 检验结果仍然保持不变。

CEO 组织认同对税收规避产生重要的影响, 并且在信息透明度较高和税收征管力度较弱的情景下这一影响依然存在。研究结果有助于理解中国制度背景下企业的税收规避行为, 也为税务机关、监管机构和企业提供有益启示, 在实践中对上市企业完善高管人力资源计划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 组织认同; 税收规避; 信息透明度; 税收征管力度; 有效税率

**中图分类号:** F275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3969/j.issn.1672-0334.2021.05.011](https://doi.org/10.3969/j.issn.1672-0334.2021.05.011)

**文章编号:** 1672-0334(2021)05-0134-12

## 引言

组织认同是指个体与组织之间的认知性过程, 当个体的自我概念中包含组织身份的属性时, 组织认同就会产生<sup>[1]</sup>。组织认同强调组织成员身份对于个体自我概念的影响, 也强调个体对组织归属感、与组织的一致性和对组织的情感依赖。高管作为企业决

策的直接制定者和执行者, 其心理特征对企业行为产生重要的影响。DREYENG et al.<sup>[2]</sup> 研究高管的任职经历, 对比分析高管被聘用和离职前后企业税收规避的变化, 发现高管个人对税收规避决策产生重大影响, 虽然高管本人不一定是税务专家, 但能通过制定避税的基调或者通过聘用税务专家, 对企业税收

**收稿日期:** 2019-01-24    **修返日期:** 2019-10-18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71862017, 71332004); 江西省自然科学基金(20181BAA208026); 财政部会计名家培养工程(财会[2016]15号); 第64批中国博士后基金(2018M642587)

**作者简介:** 周美华, 管理学博士, 江西财经大学会计学院副教授, 研究方向为基于组织行为学的会计和财务等, 代表性学术成果为“CEO 组织认同能抑制盈余管理吗? ——来自中国上市公司调查问卷的证据”, 发表在 2018 年第 4 期《南开管理评论》, E-mail: zhoumh\_sysbs@126.com

兰明慧, 中央财经大学商学院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公司金融和会计等, E-mail: minghulan@126.com

林斌, 经济学博士, 中山大学管理学院教授, 研究方向为内部控制等, 代表性学术成果为“基于信息披露的内部控制指数研究”, 发表在 2016 年第 12 期《会计研究》, E-mail: mnslb@126.com

规避决策产生重要影响;王娜等<sup>[3]</sup>发现高管的过度自信使避税程度显著提高。当CEO组织认同越高时,其与组织的一致性越高,会为企业的长远利益着想,同时也更敬业和努力工作。企业税负是政府对企业投资收益的分享,是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CEO在做出税收规避决策时需要考虑收益和成本,对组织认同程度不同的CEO,在考虑税收规避的收益和成本时可能存在较大的差异。DESAI et al.<sup>[4]</sup>研究发现,企业在税收筹划过程中往往通过复杂的交易掩盖税收规避行为,在为企业节税的同时却提高了信息不对称程度,从而为高管的机会主义行为提供了空间,增加了企业的代理成本。已有研究发现,CEO的组织认同度越高,其机会主义行为越少,代理成本也越低<sup>[5]</sup>。因此,本研究从税收规避的收益和成本以及代理理论的角度,研究CEO组织认同与税收规避之间的关系,同时考察信息透明度和税收征管力度不同时,CEO组织认同与税收规避之间的关系。

## 1 相关研究评述

ASHFORTH et al.<sup>[6]</sup>将社会身份理论引入组织环境,重新定义了组织认同的概念。从此组织认同成为组织行为学研究中一个重要方向,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sup>[7-8]</sup>。组织认同在个体、群体和组织层次上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个体对组织的认同越高,就越对组织表现出支持性的态度和行为。对组织认同结果变量的研究中占主导地位的是社会身份理论,社会身份理论用身份同一性、去人格化和自我肯定这3种作用机制解释组织认同对员工态度和行为的影响。MAEL et al.<sup>[9]</sup>的研究表明,对母校有较高认同的校友更倾向于向母校捐赠,并亲自或劝说别人参加母校的活动。高组织认同的员工倾向于对自己和组织身份中相同的特性给予积极评价,DUTTON et al.<sup>[1]</sup>研究发现,高组织认同的员工认为组织的身份和外部形象更具有吸引力;BERGAMI et al.<sup>[10]</sup>的研究表明,组织认同对组织承诺和基于组织的自尊产生显著影响。组织认同能将自我概念提升到群体水平,VAN DICK et al.<sup>[11]</sup>对组织认同与工作满意度的关系进行研究,发现生涯认同和团队认同中的评价维度可显著提升工作满意度。进一步,BAMBER et al.<sup>[12]</sup>的调查表明,组织认同显著降低组织-职业冲突和员工离职意图;张淑华等<sup>[13]</sup>采用元分析方法探索组织认同与离职意向的关系,也发现整体上组织认同与离职意向呈较高程度的负相关,离职意向作为个体与组织心理联结的背离倾向,与组织认同有密切的关系。该研究为人力资源管理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DUKERICH et al.<sup>[14]</sup>的研究表明,组织认同的强度对组织内部合作产生显著影响。该结论对于提高团队合作绩效具有重要的影响。郭晟豪等<sup>[15]</sup>发现国企员工的组织认同抑制了工作偏离行为。以上研究表明组织认同带来了正面效应。王汉瑛等<sup>[16]</sup>发现组织认同越高或者职业认同越低,内部审计师的亲组织非伦理行为倾向越高;WEBER et al.<sup>[17]</sup>研究发现良好的组

织文化认同对并购中的文化冲突有明显抑制作用,并能提高长期并购绩效。该研究表明文化认同在并购中的作用,并且是较少直接探讨绩效的一项研究。

以上研究主要是基于企业员工,BOIVIE et al.<sup>[5]</sup>将CEO的组织认同嵌入公司治理框架,研究其公司治理作用,结果发现CEO组织认同能显著降低代理成本,CEO组织认同较高时,董事会独立性对代理成本的治理作用降低,说明两者之间存在替代效应,CEO组织认同起到公司治理作用。该研究拓展了组织认同的研究范畴,不同的身份认同会带来不同的效应。HILLMAN et al.<sup>[18]</sup>从理论上分析董事多重身份的监督效应和资源支持效应;ZHU et al.<sup>[19]</sup>为此提供了实证证据,以中国国有上市企业为样本,研究政府背景的董事会成员的双重身份(准政府官员和董事会成员)如何监督和支持企业,发现对企业认同感越高的董事,会提高监督效率,也会提供资源支持,对政府认同感越高的董事,会根据国有股权的高低调整这两种效应。组织认同是对薪酬契约的有效补充,ABERNETHY et al.<sup>[20]</sup>从高管薪酬契约的角度研究CFO组织认同与盈余操控的关系,发现认同度越高的CFO,更不可能去操控盈余以满足薪酬契约。

对于税收规避的影响因素已有大量研究成果,本研究从宏观层面、企业层面和高管个人特征方面展开总结和分析。从宏观层面看,良好的金融发展环境对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增加企业的融资渠道,降低融资成本,缓解融资约束,从而降低税收规避的边际收益,陈作华等<sup>[21]</sup>的实证研究为上述论断提供了经验证据。CAI et al.<sup>[22]</sup>发现企业处于竞争激烈的行业时,为了获得更多融资,确保其在行业中的竞争优势,会进行更多的税收规避。随着中国对环境问题的日益重视,环境规则可以增加增值税进项抵扣、所得税税前加计扣除而降低企业税收<sup>[23]</sup>。刘凤委等<sup>[24]</sup>发现脱离企业实际业绩的税负波动与地方政府不规范的税收征管行为密切相关。政府是企业关键的外部环境,政府核心官员的变更会给企业的税收负担带来重要的影响。KATZ et al.<sup>[25]</sup>从理论角度分析企业在面临不确定性时更可能进行逃税,而陈德球等<sup>[26]</sup>的实证研究支持这一论断。

针对企业特征的研究,李万福等<sup>[27]</sup>发现内部控制质量越高的企业,实际税负越低。产权性质方面,刘行等<sup>[28]</sup>的研究表明,随着金融发展程度的提高,民营企业的税负将进一步加重;吴联生<sup>[29]</sup>认为税收是影响企业价值的重要途径,国有企业的税负更高,所以企业价值更低。该研究部分解释了为什么国有企业的价值较低,而彭韶兵等<sup>[30]</sup>发现民营企业的税收规避程度更为严重。企业核心高管的政治关系可以帮助企业进行税收规避,ADHIKARI et al.<sup>[31]</sup>和WU et al.<sup>[32]</sup>的研究表明,政府会给予拥有政治身份的企业更多税收优惠;罗党论等<sup>[33]</sup>发现民营企业与政府建立良好关系能降低企业的税负;李维安等<sup>[34]</sup>认为政治身份能产生避税效应,当地方政府面临较大的经

济增长和财政压力时,政治身份产生的避税效应更明显。企业的金字塔层级可以降低地方政府对地方国有企业的直接干预,刘行等<sup>[35]</sup>研究金字塔结构对企业税负的影响,发现金字塔层级越高,企业税负越低,为政府干预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提供了间接证据。

除企业特征和公司治理外,管理者个人特征和行为因素对企业的税收规避产生重要影响。DYLENG et al.<sup>[2]</sup>发现企业高管是税收规避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REGO et al.<sup>[36]</sup>认为当高管的权益激励越高时,税收激进度越高,实际税负越小;CHYZ<sup>[37]</sup>研究高管个人的税收激进度对企业税收规避的影响,发现高管越激进,企业避税程度越高。具体到高管的心理因素,关于管理者过度自信对企业财务决策影响的研究已经有丰富的成果,王娜等<sup>[3]</sup>从管理者行为偏差的角度研究管理者过度自信对税收规避的影响,发现管理者过度自信的企业,其税收规避程度显著高于管理者理性的企业。

综上所述,已有对高管组织认同的研究还比较少,而且没有探讨其与税收规避之间的关系。从税收规避影响因素的角度看,高管的心理因素主要是过度自信,而对于过度自信暂时还没有统一的测量方法,致使研究结论千差万别。本研究采用国际公认的测量组织认同的方法,较为客观地测量CEO组织认同,探讨CEO组织认同与税收规避之间的关系。

## 2 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设

当制定税收规避决策时CEO要权衡其行为的收益和成本,税收规避最大的收益是节约税金,也就是说税收规避能够将本来上交给国家的资源转变为股东资源,直接减少企业现金流出。如果CEO的薪酬与税后利润挂钩,还可以直接增加CEO的收入。为了避免被税务部门发现,管理层往往通过构建复杂的交易掩盖其避税活动,如债务加速战略、跨境股利、离岸避税天堂和离岸知识产权天堂<sup>[38]</sup>,复杂而隐蔽的交易为CEO进行利润操控、内部交易和利益攫取创造了机会<sup>[4,39]</sup>,这对CEO来说也是一种收益。

税收规避的最大成本是被税务部门查处后,企业除了补交税金外,还要支付相应的罚金,减少了现金流量,甚至社会声誉受损<sup>[40-41]</sup>。BALAKRISHNAN et al.<sup>[42]</sup>认为税收规避导致组织结构复杂化,进而带来信息透明度的下降,降低了与外部利益相关者沟通的效率。最后一种重要的非税成本是股价下跌,如果外部投资者意识到税收规避是高管为了攫取利益,可能用脚投票,致使股价下跌。

基于社会学视角,组织认同被认为是个体由于具有组织成员身份而产生的一种自我定义,由于这种成员身份而产生价值观上的一致性和情感上的归属感<sup>[43]</sup>。组织认同高的CEO更会考虑企业将来发展,而不在意一时的得失,也更在意税收规避带来的成本,也就是说组织认同越高的CEO对税收规避的收益和成本的考量是不对称的,其更看重成本。并且从长

期看,处理好与政府各个部门的关系会得到政府的支持。因此,基于税收规避的收益和成本考虑,CEO组织认同越高的企业,越不可能进行税收规避。

基于代理理论的研究表明,避税程度越高的企业,其内部代理成本越高<sup>[28]</sup>;而CEO组织认同是一种重要的公司治理机制,可以显著降低企业的代理成本<sup>[5]</sup>。另外,税收规避行为增加了管理层的风险,相应的薪酬应对此做出补偿,这破坏了薪酬契约的稳定性,激励契约的失效加剧了代理冲突<sup>[44]</sup>;而组织认同越高的CEO会将自己的命运与组织紧密结合,是对薪酬契约的有效补充,这增加了薪酬契约的稳定性<sup>[20]</sup>。因此,从CEO组织认同缓解代理问题的角度,其与税收规避之间存在负向关系。基于上述分析,本研究提出假设。

$H_1$  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CEO组织认同与税收规避显著负相关。

较高的信息透明度可以降低企业内外部信息的不对称程度,减轻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还可以及时地向资本市场传达投资信息,降低企业融资成本,使创新和创业过程中因资金缺乏而失败的可能性降低。组织认同越高的CEO,其越可能为企业的将来着想,而信息透明度的提升可以向资本市场更准确地传达企业信息,进而提升企业价值。因此,本研究进一步探讨在不同信息透明度的企业中CEO组织认同与税收规避的关系。

基于税收规避的成本和收益视角,提高信息透明度将降低税收规避的收益并增加其成本。首先,信息透明度能降低管理层的私有收益<sup>[45]</sup>,所以管理层可能没有动机进行税收规避。其次,信息透明度越高,税务部门越容易发现企业的税收规避行为,导致相关部门调查的概率越高,从而减少CEO用于经营管理企业的时间,组织认同越高的CEO越可能避免这种情况发生。基于上述分析,本研究提出假设。

$H_2$  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在信息透明度较高的企业,CEO组织认同与税收规避显著负相关。

税收是政府对企业现金流的强制分享,是一种重要的外部力量。从这个角度看,政府可以看作是一种特殊类型的“股东”<sup>[39]</sup>。企业的避税程度是成本与收益权衡的结果,企业面临的成本主要是避税被税务部门发现后带来的处罚成本和相应的声誉损失<sup>[46]</sup>。法律规定,税务部门可以对企业的会计账目进行检查,因此,税收征管可以视作对企业运营和监管的重要外部力量<sup>[47]</sup>。随着税收征管力度的加强,税务部门在税务检查中发现企业避税行为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一旦税务部门对企业的课税行为产生质疑,企业和管理层面临的风险将显著上升<sup>[36]</sup>。基于税收征管这种外部治理作用,CEO组织认同的内部治理作用将会下降,即在税收征管力度较强的地区,CEO组织认同与税收规避的负向关系将减弱;而在税收征管力度较弱的地区,CEO组织认同与税收规避的负向关系加强。综上所述,本研究提出假设。

$H_3$  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在税收征管力度越

弱的地区,CEO 组织认同与税收规避显著负相关。

### 3 研究设计

#### 3.1 数据来源和样本选择

本研究的组织认同数据来自中国证监会上市企业内部控制调研课题组,于2014年9月5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证监会会计部和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分别向A股上市公司、具有证券期货执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和机构投资者发放调查问卷。截至2014年10月31日,共向2536家A股上市公司发放问卷,回收2154套调查问卷,共12551份,回收率为84.93%。课题组从以下3个方面保证调查问卷的科学性和有效性,①该调查问卷获得中国证监会批准,鉴于中国证监会对中国证券市场的监管,CEO 将给予重视并分配时间和精力完成该问卷调查;②课题组要求调查对象实名填写,以供后期数据复核;③在2014年11月课题组随机抽取12家公司进行访谈和实地调研,对调查问卷填写进行复核,访谈结果显示结果可靠。

借鉴已有研究的做法,本研究依据以下标准对样本进行筛选和处理:①考虑到组织认同可能在短时间内不会发生较大的变化,本研究将样本期前后各延展1年,即本研究的样本区间为2013年至2015年,也即自变量CEO 组织认同在三年中是相同的,但因变量和其他控制变量为每家公司在3年中相应的数据,同时在回归中采用公司层面的聚类分析;②剔除金融行业上市企业;③组织认同需要时间积淀,剔除发生CEO 变更的企业,即选取2013年至2015年CEO 没有发生变化的样本;④剔除数据缺失的企业。经过上述处理,最终得到5209个企业-年观测值。本研究的名义所得税税率、各地区年末税收收入、GDP、第一产业产值、第二产业产值和地区开放度(年末的进出口总额)数据来自WIND 数据库,其他数据来自CSMAR 数据库。为了消除极端值的影响,对所有连续变量进行1% 和99% 水平的截尾处理。

#### 3.2 变量定义

(1)关于税收规避,本研究参考CHEN et al.<sup>[48]</sup>、陈德球等<sup>[26]</sup>和后青松等<sup>[49]</sup>的研究,用企业名义所得税率与实际所得税率的差额表征企业税收规避程度,差值越大,表明企业税收规避程度越高。实际所得税率等于当期所得税费用与税前总利润之比,当期所得税费用等于总的所得税费用减去递延所得税费用。

(2)关于CEO 组织认同。本研究参与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内部控制调研课题组的工作,在2014年调研中设计问卷时参考MAEL et al.<sup>[9]</sup>的组织认同量表,该量表信度较高,受到很多学者青睐。该量表测量员工对组织的认同,有6个题项,具体为“当有人批评我的企业时我感觉就像在批评自己一样”“我很想知道其他人是怎样看待我的企业的”“我经常用‘我们……’描述我的企业,而不是用‘他们……’”“我认为我的企业成功就是我的成功”“当有人赞扬我

的企业时我感觉也是对我的赞扬”“假如我的企业因某事被媒体批评,我会感觉很尴尬”。采用 Likert 5 点评分法,1 为完全不符合,5 为完全符合。在计算组织认同变量时将6个题项分数加总。

(3)根据研究假设,本研究探讨信息透明度和税收征管力度对CEO 组织认同与税收规避之间关系的影响。参考BHARATH et al.<sup>[50]</sup>的研究,本研究采用盈余管理程度测量企业内部的信息透明度。已有研究大多用修正的Jones 模型计算的操控性应计利润测量盈余管理,KOTHARI et al.<sup>[51]</sup>认为,使用操控性应计利润测量盈余管理存在一定的误差,并提出用业绩匹配方法重新计算盈余管理,即在修正的Jones 模型中加入总资产报酬率,能更好地估计操控性应计利润。具体模型为

$$\frac{TA_{i,t}}{Ass_{i,t-1}} = \alpha_0 \frac{1}{Ass_{i,t-1}} + \alpha_1 \frac{\Delta Rev_{i,t} - \Delta Rec_{i,t}}{Ass_{i,t-1}} + \alpha_2 \frac{Ppe_{i,t}}{Ass_{i,t-1}} + \alpha_3 Roa_{i,t-1} + \varepsilon_{i,t} \quad (1)$$

其中,i为企业,t为年;  $TA_{it}$  为总应计利润,  $TA_{it} = NI_{it} - CF_{it}$ ,  $NI_{it}$  为净利润,  $CF_{it}$  为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  $Ass_{i,t-1}$  为上年末总资产,  $\Delta Rev_{i,t}$  为营业收入增加额;  $\Delta Rec_{i,t}$  为应收账款增加额;  $Ppe_{i,t}$  为年末固定资产,  $Roa_{i,t-1}$  为总资产报酬率;  $\alpha_0$  为截距项,  $\alpha_1 \sim \alpha_3$  为回归系数,  $\varepsilon_{i,t}$  为残差项。本研究采用(1)式进行分行业分年度回归,其残差即为操控性应计利润,采用操控性应计利润的绝对值测量信息透明度,该值越大,信息透明度越低。

参考曾亚敏等<sup>[47]</sup>和陈德球等<sup>[26]</sup>的研究,本研究用各地区实际税收收入与预期可获得的税收收入之比测量税收征管力度。估计各地区预期可获得的税收收入的模型为

$$\frac{Tax_{j,t}}{GDP_{j,t}} = \beta_0 + \beta_1 \frac{Ind1_{j,t}}{GDP_{j,t}} + \beta_2 \frac{Ind2_{j,t}}{GDP_{j,t}} + \beta_3 \frac{Ope_{j,t}}{GDP_{j,t}} + \varphi_{j,t} \quad (2)$$

其中,j为省;  $Tax$  为年末本地实际税收收入;  $GDP$  为年末国内生产总值;  $Ind1$  为年末第一产业产值;  $Ind2$  为年末第二产业产值;  $Ope$  为开放程度,等于各省年末进出口总额;  $\beta_0$  为截距项,  $\beta_1 \sim \beta_3$  为回归系数,  $\varphi$  为残差项。将各省数据代入(2)式进行回归,得到回归系数,然后根据回归系数计算预期的可获得税收收入。

(4)本研究借鉴陈德球等<sup>[26]</sup>的研究选取控制变量,一是企业基本面的控制变量,包括未被操控的资产报酬率、企业规模、产权性质、资产负债率、存货密集度、有形资产密集度、无形资产密集度、企业成长性、企业上市年限、独立董事比例、董事会规模和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二是外部审计对税收规避产生重要影响,将非标意见和会计师事务所作为控制变量;三是为了减少行业和年份层面遗漏变量的影响,控制年度和行业虚拟变量。变量定义见表1。

#### 3.3 实证模型

为了检验CEO 组织认同对税收规避的影响,本研究构建回归模型,即

表1 变量定义

Table 1 Definitions of Variables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变量定义
税收规避	<i>Tav</i>	名义所得税率与实际所得税率之差
CEO组织认同	<i>OI</i>	CEO对6个组织认同问题的评分之和取自然对数
信息透明度	<i>DA</i>	采用KOTHARI et al. <sup>[5]</sup> 的方法计算的操控性应计利润的绝对值
税收征管力度	<i>TE</i>	实际税收收入与预期可获得的税收收入之比
未被操控的资产报酬率	<i>Roa1</i>	净利润与平均总资产之比减去操控性应计利润
企业规模	<i>Siz</i>	总资产的自然对数
产权性质	<i>Soe</i>	国有企业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
资产负债率	<i>Lev</i>	总负债与总资产之比
存货密集度	<i>Inv</i>	年末存货净值除以年末总资产
有形资产密集度	<i>Tan</i>	年末固定资产净值除以年末总资产
无形资产密集度	<i>Int</i>	年末无形资产净值除以年末总资产
企业成长性	<i>Grt</i>	营业收入增长率
企业上市年限	<i>Age</i>	企业上市年限的自然对数
独立董事比例	<i>Irt</i>	独立董事人数与董事会人数之比
董事会规模	<i>Bds</i>	董事会人数的自然对数
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	<i>Fir</i>	第一大股东持股数与总股数之比
非标意见	<i>Mao</i>	年报被出具非标准意见时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
会计师事务所	<i>Big4</i>	聘任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
年度	<i>Yea</i>	年度虚拟变量
行业	<i>Indu</i>	行业虚拟变量,采用证监会行业分类标准

$$\begin{aligned}
 Tav_{i,t} = & \gamma_0 + \gamma_1 OI_{i,t} + \gamma_2 Roa1_{i,t} + \gamma_3 Siz_{i,t} + \gamma_4 Soe_{i,t} + \\
 & \gamma_5 Lev_{i,t} + \gamma_6 Inv_{i,t} + \gamma_7 Tan_{i,t} + \gamma_8 Int_{i,t} + \\
 & \gamma_9 Grt_{i,t} + \gamma_{10} Age_{i,t} + \gamma_{11} Irt_{i,t} + \gamma_{12} Bds_{i,t} + \\
 & \gamma_{13} Fir_{i,t} + \gamma_{14} Mao_{i,t} + \gamma_{15} Big4_{i,t} + \sum Yea + \\
 & \sum Indu + \delta_{i,t}
 \end{aligned} \quad (3)$$

其中,  $\gamma_0$  为截距项,  $\gamma_1 \sim \gamma_{15}$  为回归系数,  $\delta$  为残差项。根据 H<sub>1</sub>,  $\gamma_1$  应显著为负; 为验证 H<sub>2</sub>, 本研究将信息透明度按中位数分为高和低两组; 为验证 H<sub>3</sub>, 本研究将税收征管力度按中位数分为高和低两组。

## 4 实证结果和分析

### 4.1 描述性统计

表 2 给出描述性统计结果。税收规避的均值和中位数均为负, 与后青松等<sup>[49]</sup>的研究结果一致, 说明中国企业的税收负担较重; CEO 组织认同的均值和中位数分别为 3.225 和 3.219, 其原始值分别为 25.280 和 26, 最大值和最小值分别为 6 和 30, 表明该变量整体偏右; 税收征管力度的均值和中位数分别为 0.966 和 0.941, 与陈德球等<sup>[26]</sup>的研究结果极为接近。其他变量也与已有研究较为接近, 表明本研究对这些变

量的计算结果较为准确, 不存在较大偏差。

### 4.2 相关系数

表 3 给出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税收规避与 CEO 组织认同在 5% 水平上显著负相关, H<sub>1</sub> 得到初步验证, 说明 CEO 在做出税收规避决策时更看重税收规避带来的成本。税收规避与信息透明度显著正相关, 说明企业构建复杂的交易掩盖其避税行为, 所以其信息透明度降低; CEO 组织认同与信息透明度在 1% 水平显著负相关, 说明对企业认同感越高 CEO 越不可能进行利润操控, 其信息透明度越高。因此可以初步推断, 在信息透明度较高的企业中, CEO 组织认同与税收规避负相关, H<sub>2</sub> 得到初步验证。其他变量与已有研究基本一致, 如未被操控的资产报酬率越高, 反映企业盈利能力越强, 企业越不会税收规避, 获得非标意见和资产负债率越高的企业越可能进行税收规避。

### 4.3 回归结果分析

表 4 给出检验假设的 OLS 回归结果。表 4 全样本中, CEO 组织认同的回归系数为 -0.134, 在 1% 水平上显著, 说明 CEO 在衡量税收规避的收益与成本

**表2 描述性统计结果**  
**Table 2 Results for Descriptive Statistics**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25%分位数	中位数	75%分位数
Tav	-0.019	0.425	-0.130	-0.026	0.091
OI	3.225	0.149	3.178	3.219	3.367
DA	0.063	0.071	0.019	0.043	0.080
TE	0.966	0.166	0.845	0.941	1.111
Roal	0.032	0.065	0.007	0.030	0.063
Siz	22.060	1.239	21.240	21.910	22.750
Soe	0.394	0.489	0	0	1
Lev	0.448	0.219	0.274	0.433	0.613
Inv	0.161	0.153	0.064	0.121	0.199
Tan	0.233	0.168	0.103	0.201	0.332
Int	0.050	0.053	0.018	0.038	0.062
Grt	0.498	0.420	0.330	0.391	0.505
Age	2.306	0.609	1.757	2.384	2.887
Irt	0.374	0.055	0.333	0.333	0.429
Bds	2.135	0.198	1.945	2.197	2.197
Fir	0.350	0.150	0.232	0.330	0.450
Mao	0.033	0.178	0	0	0
Big4	0.048	0.213	0	0	0

注: 样本观测值为5 209。

后, 认为成本大于收益, 所以较少进行税收规避,  $H_1$ 得到验证。对企业认同感高的CEO更可能为企业未来着想, 如果被贴上税收规避的标签, 是对CEO声誉的巨大损害<sup>[47]</sup>, 所以CEO对企业认同感较高时并不会进行税收规避。

在表4的分组检验中, 本研究采用操控性应计利润的绝对值衡量信息透明度, 按照操控性应计利润的绝对值的中位数划分信息透明度, 小于等于中位数为信息透明度高组, 大于中位数为信息透明度低组。在信息透明度高组, CEO组织认同的回归系数为-0.208, 在1%水平上显著; 在信息透明度低组, CEO组织认同的回归系数为-0.052, 不显著。 $H_2$ 得到验证。说明信息透明度高的企业, CEO借税收规避获得的收益小于进行税收规避的成本, 因此信息透明度高的企业在资本市场上更容易进行融资(融资效应), 符合CEO组织认同感越高越为企业长远着想的观点。另外, 信息透明度高的企业更容易被税务部门发现税收规避行为(稽查效应), 但是到底是融资效应还是稽查效应占据主导地位并不清楚, 值得进一步研究。

本研究按照税收征管力度的中位数进行划分, 大于中位数的为税收征管力度强组, 小于等于中位数的为税收征管力度弱组。由表4可知, 在税收征管力度强组, CEO组织认同的回归系数为负, 但不显著; 在税收征管力度弱组, CEO组织认同的回归系数显

著为负。 $H_3$ 得到验证。说明在外部监管环境宽松的地区, CEO可以用更多的精力经营企业, 而不是应付税务部门的稽查, 或者说在外部监管较严格的环境中, 税务部门给CEO带来的成本超过收益。

在控制变量中, Roal在5个回归结果中均显著为负, 说明企业绩效越差, 越可能进行税收规避; 企业规模在3个回归结果中显著为正, 说明规模越大越可能进行税收规避, 支持了大企业可以运用更多的资源进行税收筹划和政治游说的观点; 除税收征管力度弱组, 产权性质在其他4个回归结果中均显著为负, 说明国有企业更不会进行税收规避, 这与吴联生<sup>[29]</sup>的研究结果一致, 即国有企业为政府承担各种社会性的支出; 存货密集度均显著为负, 与陈德球等<sup>[26]</sup>的研究结果一致; 企业上市年限均显著为正, 说明上市年限越长, 越可能税收规避。

## 5 进一步研究

CFO对税收规避也存在重要的影响, 本研究进一步研究CFO组织认同(CFO\_OI)对税收规避的影响, 以考察CFO组织认同是否也存在同样的效应, 检验结果见表5。表5的(1)列检验CFO组织认同对税收规避的影响, CFO组织认同的回归系数也为负, 但不显著。将CEO和CFO组织认同一起加入回归方程, (2)列中CFO组织认同回归系数为正, 仍然不显著, 但CEO组织认同的结果仍显著为负。分组检验的结果表明, CFO组织认同均为正, 但均不显著。CEO组织认同在信息透明度高和税收征管力度弱的地区仍显著为负, 说明相对于CFO, CEO更看重税收规避带来的成本。由于CFO组织认同的数据有缺失值, 表5中的观测值有所减少。

## 6 稳健性和内生性检验

在稳健性检验中, 本研究借鉴陈德球等<sup>[26]</sup>的研究, 采用有效税率(Etr)测量税收规避, 用实际所得税率测量有效税率, 检验结果见表6。表6全样本中, CEO组织认同与实际税率显著正相关, 说明CEO组织认同越高的企业, 税收负担越重, 税收规避程度越小, 进一步支持 $H_1$ 。对此, 本研究的解释是: 税收规避带来高额成本, 对企业认同感越高的CEO, 越可能具有长远目标, 并为企业的将来着想。如果被贴上税收规避的标签, 对企业和企业家声誉都是沉重的成本。分组检验结果与表4的结果一样, 说明在不同的环境下, CEO组织认同对税收规避的影响不同。

为了使本研究结论更为可靠, 本研究采用主成分分析法重新构建CEO组织认同(第1主成分), 在全样本、信息透明度高组和税收征管力度弱组, CEO组织认同的回归系数均在1%水平上显著为负; 在信息透明度低组和税收征管力度强组, CEO组织认同的回归系数均为负且不显著。以上回归结果与表4的主要结果一致, 表明本研究结果稳健可靠。

本研究进行内生性检验, 主要考虑互为因果关系的情况, 采用工具变量方法进行缓解。根据计量经

表3 相关系数  
Table 3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Tav	OI	DA	TE	Roa1	Siz	Soe	Lev	Inv	Tan	Int	Grt	Age	Irt	Bds	Fir	Mao	Big4
Tav	1																	
OI	-0.033**	1																
DA	0.039*** -0.042***	1																
TE	0.042***	0.017	1															
Roa1	-0.095***	0.025*	-0.102*** -0.043***	1														
Siz	0.025*	0.003	-0.060***	0.055***	0.093***	1												
Soe	0.025*	-0.018	-0.045***	0.113*** -0.131***	0.326***	1												
Lev	0.068*** -0.027*	0.137***	0.059*** -0.387***	0.430***	0.285***	1												
Inv	-0.074***	0.007	0.108*** -0.009	-0.084***	0.142***	0.040***	1											
Tan	0.049***	0.008	-0.126*** -0.010	-0.167***	0.056***	0.164***	0.065*** -0.352***	1										
Int	0.035***	0.015	-0.068*** -0.006	-0.053*** -0.043***	0.035***	-0.041**	-0.222***	0.102***	1									
Grt	-0.017	-0.008	0.206*** -0.002	0.154***	0.018	-0.081***	0.032**	-0.091*** -0.020***	0.032**	1								
Age	0.102*** -0.006	0.062***	0.129*** -0.162***	0.227***	0.446***	0.368***	0.151***	0.055***	0.033*** -0.022	1								
Irt	0.010	0.017	0.025*	0.001	-0.020	-0.002	-0.074***	-0.016	0.023* -0.051***	-0.012	0.020	-0.043***	1					
Bds	0.001	-0.007	-0.075***	0.031**	0.020	0.260***	0.131*** -0.054***	0.149***	0.018	-0.035***	0.120*** -0.527***	1						
Fir	-0.037***	-0.003	-0.036***	0.028**	0.111***	0.261***	0.208***	0.045***	0.076***	0.047*** -0.022	-0.007	-0.066***	0.042***	0.010	1			
Mao	0.064*** -0.009	0.101***	0.026*	-0.264***	-0.118***	0.010	0.183*** -0.025*	0.006	-0.012	-0.017	0.098*** -0.007	-0.005	-0.071***	1				
Big4	0.001	-0.035**	-0.029**	0.037***	0.050***	0.360***	0.129***	0.095*** -0.027*	0.074***	0.050*** -0.036***	0.062***	0.025*	0.086***	0.137*** -0.021	1			

注：\*\*为在1%水平上显著，\*\*\*为在5%水平上显著，\*为在10%水平上显著，下同。

表4 回归结果  
Table 4 Regression Results

变量	Tav				
	全样本	信息透明度高	信息透明度低	税收征管力度强	税收征管力度弱
OI	-0.134*** (-3.235)	-0.208*** (-3.329)	-0.052 (-0.927)	-0.037 (-0.603)	-0.205*** (-3.551)
Roa1	-0.591*** (-5.958)	-0.565*** (-2.641)	-0.627*** (-5.932)	-0.707*** (-5.107)	-0.438*** (-3.007)
Siz	0.016** (-2.387)	0.025** (-2.393)	0.011 (-1.155)	0.008 (-0.831)	0.022** (-2.327)
Soe	-0.039*** (-2.446)	-0.037* (-1.713)	-0.045* (-1.882)	-0.075*** (-3.346)	-0.009 (-0.388)
Lev	0.057 (-1.411)	0.077 (-1.149)	0.041 (-0.796)	0.138** (-2.411)	0.006 (-0.105)
Inv	-0.398*** (-6.395)	-0.476*** (-4.993)	-0.349*** (-4.208)	-0.613*** (-7.176)	-0.177* (-1.932)
Tan	-0.112** (-2.456)	-0.104 (-1.544)	-0.124** (-1.962)	-0.190*** (-2.665)	-0.059 (-1.007)
Int	0.024 (-0.176)	-0.177 (-0.989)	0.158 (-0.755)	0.038 (-0.217)	0.091 (-0.419)
Grt	-0.006 (-0.469)	-0.022 (-1.087)	-0.001 (-0.046)	-0.008 (-0.744)	-0.005 (-0.226)
Age	0.057*** (-4.782)	0.037** (-2.186)	0.071*** (-4.289)	0.068*** (-4.112)	0.046** (-2.551)
Irt	0.064 (-0.532)	0.058 (-0.308)	0.036 (-0.226)	-0.054 (-0.297)	0.214 (-1.272)
Bds	-0.042 (-1.087)	-0.098* (-1.719)	0.011 (-0.204)	-0.067 (-1.071)	-0.005 (-0.099)
Fir	-0.083** (-1.973)	-0.106* (-1.883)	-0.051 (-0.832)	-0.081 (-1.420)	-0.068 (-1.121)
Mao	0.055 (-1.302)	0.136* (-1.855)	0.006 (-0.112)	-0.003 (-0.045)	0.081 (-1.278)
Big4	-0.037 (-1.158)	-0.068 (-1.438)	-0.003 (-0.070)	0.042 (-0.909)	-0.121*** (-2.881)
常数项	0.267 (-1.226)	0.460 (-1.357)	-0.016 (-0.058)	0.267 (-0.839)	0.169 (-0.565)
Yea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Indu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F	11.660***	6.710***	7.090***	7.930***	5.600***
观测值	5 209	2 604	2 605	2 528	2 681
调整的R <sup>2</sup>	0.050	0.056	0.059	0.086	0.038

注: 括号内数据为t统计量, 下同。

济学原理, 选择的工具变量须与自变量相关、与残差项不相关。本研究选择的第一个工具变量为CEO第1份工作是否在该企业的虚拟变量, 在该企业取值为1, 否则取值为0。如果CEO一直在该企业工作, 说明对这家企业非常认可。第2个工具变量为进入管理层的时限, 时间越长对企业的认同度越高。已有研

究没有发现这两个工具变量与税收规避之间的关系。工具变量的检验结果见表7, 无论是采用税收规避还是有效税率作为因变量, CEO组织认同均在10%水平上显著, 表明本研究内生性问题不严重。由于工具变量有缺失值, 表7中的观测值较前文更少。

为了使研究结果更加稳健, 本研究还进行了其他

**表5 进一步研究**  
**Table 5 Further Research**

变量	Tav					
	全样本 (1)	全样本 (2)	信息透明度高 (3)	信息透明度低 (4)	税收征管力度强 (5)	税收征管力度弱 (6)
OI		-0.165*** (-3.487)	-0.250*** (-3.369)	-0.078 (-1.287)	-0.081 (-1.164)	-0.215*** (-3.266)
CFO_OI	-0.005 (-0.164)	0.042 (-1.280)	0.056 (-1.176)	0.036 (-0.826)	0.070 (-1.548)	0.007 (-0.138)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0.136 (-0.687)	0.235 (-1.056)	0.425 (-1.243)	-0.052 (-0.180)	0.170 (-0.522)	0.158 (-0.518)
F	11.030***	11.190***	6.310***	6.890***	7.560***	5.580***
观测值	5 098	5 098	2 545	2 553	2 482	2 616
调整的R <sup>2</sup>	0.047	0.049	0.053	0.060	0.083	0.039

**表6 稳健性检验：因变量为有效税率**  
**Table 6 Robust Test: Dependent Variable As Effective Tax Rate**

变量	Etr				
	全样本 (1)	信息透明度高 (2)	信息透明度低 (3)	税收征管力度强 (4)	税收征管力度弱 (5)
OI	0.132*** (-3.139)	0.205*** (-3.226)	0.051 (-0.902)	0.031 (-0.484)	0.207*** (-3.573)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0.139 (-0.634)	-0.323 (-0.946)	0.140 (-0.497)	-0.139 (-0.430)	-0.052 (-0.172)
F	10.060***	6.270***	5.900***	6.460***	7.860***
观测值	5 209	2 604	2 605	2 528	2 681
调整的R <sup>2</sup>	0.040	0.045	0.049	0.072	0.032

**表7 内生性检验结果**  
**Table 7 Test Results for Endogeneity**

变量	Tav		Etr	
	全样本	全样本	全样本	全样本
OI	-1.386* (-1.877)	0.420* (-1.744)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4.018* (-1.733)	-1.233 (-1.620)		
F	5.340***	14.260***		
观测值	4 857	4 857		

检验。首先,按产权性质将样本分为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分组检验结果表明,CEO组织认同与税收规避均在5%水平上显著负相关,说明无论在国有企业还是在非国有企业,CEO组织认同对税收规避都产生显著影响。其次,采用深圳交易所披露的透明

度指数,该指数将在深圳交易所上市的企业信息披露考评结果分为A、B、C、D共4个结果。本研究将A和B归为一组,表示信息透明度高组;将C和D归为一组,表示信息透明度低组。分组检验结果表明,CEO组织认同在信息透明度高组显著为负,在信息透明度低组为负但不显著,H<sub>2</sub>再次得到验证。

## 7 结论

本研究探讨CEO组织认同与税收规避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CEO组织认同与税收规避显著负相关,这种关系仅存在于信息透明度高和税收征管力度弱的地区。本研究还发现CFO组织认同与税收规避负相关但不显著,并且对CEO组织认同与税收规避之间的关系没有影响,说明与CFO相比,CEO更看重税收规避带来的成本。稳健性检验方面,本研究采用有效税率替代税收规避,研究结果没有变化;采用主成分分析法重新构建CEO组织认同,研究结果也没有变化。采用工具变量缓解可能的内生性问题,结果仍保持不变。

本研究的理论意义在于:①已有关于组织认同的实证研究主要针对企业员工,本研究针对高管的组织认同进行探索,拓展了已有组织认同的研究,尤其是考虑到企业高管的重要性,本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②已有关于公司治理理论的研究甚少考虑高管的心理因素,本研究发现CEO组织认同可以降低税收规避,是一种重要的公司治理机制,是对公司治理理论的有益补充。

本研究结果具有一定的政策启示:①对于税收征管部门来说,提升CEO组织认同并不会必然地带来更多的税收规避,这可能是CEO在综合考虑税收规避的收益和成本之后的结果。这一结果为税收征管工作提供了参考,当税收征管部门提高企业非法避税的处罚力度时,将增加企业税收规避的成本,组织认同感较高的CEO综合权衡这一成本后将会减少税收规避,因此税收征管部门采取严格的措施将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税收的公平性。②根据税收规避的代理观,税收规避可能是代理问题的体现,所以对于投资者来说,其观察到的企业税收规避现象不一定提高企业价值,很可能是一种代理问题的表现,在对企业估值时一定要分辨清楚是真实的税收规避还是代理问题。

本研究探讨CEO组织认同与税收规避的关系,而不是因果关系,虽然极力地想找到一个外生冲击事件推断它们的因果关系,但是鉴于数据的局限性,很难找到这样的事件。本研究从税收规避的收益和成本以及代理理论的角度,分析CEO组织认同与税收规避之间的关系,但是到底是哪种理论起到更大的解释作用,本研究没有对此进行分析和论证。

## 参考文献:

- [1] DUTTON J E, DUKERICH J M, HARQUAIL C V. Organizational images and member identification.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1994, 39(2): 239–263.
- [2] DYRENG S D, HANLON M, MAYDEW E L. The effects of executives on corporate tax avoidance. *The Accounting Review*, 2010, 85(4): 1163–1189.
- [3] 王娜,叶玲.管理者过度自信,产权性质与税收规避:基于我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山西财经大学学报*, 2013, 35(6): 81–90.  
WANG Na, YE Ling. Managerial overconfidence, ownership nature of ultimate controller and tax avoidance: evidence based on Chinese listed companies. *Journal of Shanxi University Finance and Economics*, 2013, 35(6): 81–90.
- [4] DESAI M A, DHARMAPALA D. Corporate tax avoidance and high-powered incentives.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2006, 79(1): 145–179.
- [5] BOIVIE S, LANGE D, MCDONALD M L, et al. Me or we: the effects of CEO organizational identification on agency costs.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2011, 54(3): 551–576.
- [6] ASHFORTH B E, MAEL F. Social identity theory and the organization. *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989, 14(1): 20–39.
- [7] PRATT M G. To be or not to be? Central questions in organizational identification//Whetten D A, Godfrey P C. *Identity in Organizations: Building Theory Through Conversations*. Thousand Oaks, CA: SAGE, 1998: 171–207.
- [8] ROUSSEAU D M. Why workers still identify with organizations. *Journal of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1998, 19(3): 217–233.
- [9] MAEL F, ASHFORTH B E. Alumni and their alma mater: a partial test of the reformulated model of organizational identification. *Journal of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1992, 13(2): 103–123.
- [10] BERGAMI M, BAGOZZI R P. Self-categorization, affective commitment and group self-esteem as distinct aspects of social identity in the organization. *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2000, 39(4): 555–577.
- [11] VAN DICK R, WAGNER U, STELLMACHER J, et al. The utility of a broader conceptualization of organizational identification: which aspects really matter?. *Journal of Occupational and Organizational Psychology*, 2004, 77(2): 171–191.
- [12] BAMBER E M, IYER V M. Big 5 auditors' professional and organizational identification: consistency or conflict?. *Auditing A Journal of Practice & Theory*, 2002, 21(2): 21–38.
- [13] 张淑华,刘兆延.组织认同与离职意向关系的元分析. *心理 学报*, 2016, 48(12): 1561–1573.  
ZHANG Shuhua, LIU Zhaoyan. A meta-analysi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rganizational identification and turnover intention. *Acta Psychologica Sinica*, 2016, 48(12): 1561–1573.
- [14] DUKERICH J M, GOLDEN B R, SHORTELL S M. Beauty is in the eye of the beholder: the impact of organizational identification, identity, and image on the cooperative behaviors of physicians.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2002, 47(3): 507–533.
- [15] 郭景豪,萧鸣政.认同还是承诺?国企员工组织中的认同,组织承诺与工作偏离行为. *商业经济与管理*, 2017(8): 48–58.  
GUO Shenghao, XIAO Mingzheng. Identification or commitment? Identification and deviant behavior in SOEs: 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 as a negative mediator. *Journal of Business Economics*, 2017(8): 48–58.
- [16] 王汉瑛,田虹,邢红卫.内部审计师的亲组织非伦理行为:基于双重认同视角. *管理科学*, 2018, 31(4): 30–44.  
WANG Hanying, TIAN Hong, XING Hongwei. Research on internal auditors' unethical pro-organizational behavio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ual identification. *Journal of Management Science*, 2018, 31(4): 30–44.
- [17] WEBER Y, DRORI I. Integrating organizational and human behavior perspectives on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International Studies of Management & Organization*, 2011, 41(3): 76–95.
- [18] HILLMAN A J, NICHOLSON G, SHROPSHIRE C. Directors' multiple identities, identification, and board monitoring and resource provision. *Organization Science*, 2008, 19(3): 441–456.
- [19] ZHU H J, YOSHIKAWA T. Contingent value of director identification:the role of government directors in monitoring and resource provision in an emerging economy.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16, 37(8): 1787–1807.
- [20] ABERNETHY M A, BOUWENS J, KROOS P. Organization identity and earnings manipulation. *Accounting, Organizations and Society*, 2017, 58: 1–14.
- [21] 陈作华,方红星.融资约束、内部控制与企业避税. *管理科学*, 2018, 31(3): 125–139.  
CHEN Zuohua, FANG Hongxing. Financial constraints, internal control and corporate tax avoidance. *Journal of Management Sciences*, 2018, 31(3): 125–139.

- [22] CAI H B, LIU Q. Competition and corporate tax avoidance: evidence from Chinese industrial firms. *The Economic Journal*, 2009, 119(537): 764–795.
- [23] 曹越, 易冰心, 胡新玉, 等. “营改增”是否降低了所得税税负: 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 *审计与经济研究*, 2017, 32(1): 90–103.
- CAO Yue, YI Bingxin, HU Xinyu, et al. Whether replacing the BT with a VAT reduces income tax burden: evidence from Chinese listed companies. *Journal of Audit & Economics*, 2017, 32(1): 90–103.
- [24] 刘凤委, 邬展霞, 眭洋扬. 市场化程度、产权性质与公司税负波动研究. *税务研究*, 2016(3): 103–107.
- LIU Fengwei, WU Zhanxia, SUI Yangyang. A study of the impact of degree of marketization and nature of property rights on the fluctuations in corporate tax burden. *Taxation Research*, 2016(3): 103–107.
- [25] KATZ B G, OWEN J. Exploring tax evasion in the context of political uncertainty. *Economic Systems*, 2013, 37(2): 141–154.
- [26] 陈德球, 陈运森, 董志勇. 政策不确定性、税收征管强度与企业税收规避. *管理世界*, 2016, 32(5): 151–163.
- CHEN Deqiu, CHEN Yunsen, DONG Zhiyong. Policy uncertainty, tax enforcement and corporate tax avoidance. *Journal of Management World*, 2016, 32(5): 151–163.
- [27] 李万福, 陈晖丽. 内部控制与公司实际税负. *金融研究*, 2012(9): 195–206.
- LI Wanfu, CHEN Huili. Internal control and corporate effective tax rate. *Journal of Financial Research*, 2012(9): 195–206.
- [28] 刘行, 叶康涛. 金融发展、产权与企业税负. *管理世界*, 2014, 30(3): 41–52.
- LIU Hang, YE Kangtao. The financial development, the property right and the tax burden on firms. *Journal of Management World*, 2014, 30(3): 41–52.
- [29] 吴联生. 国有股权、税收优惠与公司税负. *经济研究*, 2009, 44(10): 109–120.
- WU Liansheng. State ownership, preferential tax, and corporate tax burdens. *Economic Research Journal*, 2009, 44(10): 109–120.
- [30] 彭韶兵, 王伟. 上市公司“出身”与税收规避. *宏观经济研究*, 2011(1): 41–49.
- PENG Shaobing, WANG Wei. “Origin” of the listed companies and tax evasion. *Macroeconomics*, 2011(1): 41–49.
- [31] ADHIKARI A, DERASHID C, ZHANG H. Public policy, political connections, and effective tax rates: longitudinal evidence from Malaysia.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Public Policy*, 2006, 25(5): 574–595.
- [32] WU W F, WU C F, ZHOU C Y, et al. Political connections, tax benefits and firm performance: evidence from China.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Public Policy*, 2012, 31(3): 277–300.
- [33] 罗党论, 魏煮. 政治关联与民营企业避税行为研究: 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南方经济*, 2012(11): 29–39.
- LUO Danglun, WEI Zhu. Political connection and the tax avoidance of enterprises: the evidence from Chinese private listing enterprises. *South China Journal of Economics*, 2012(11): 29–39.
- [34] 李维安, 徐业坤. 政治身份的避税效应. *金融研究*, 2013(3): 114–129.
- LI Weian, XU Yekun. The effect of political identity on tax avoidance. *Journal of Financial Research*, 2013(3): 114–129.
- [35] 刘行, 李小荣. 金字塔结构, 税收负担与企业价值: 基于地方国有企业的证据. *管理世界*, 2012, 28(8): 91–105.
- LIU Hang, LI Xiaorong. The Pyramid structure, the tax burden and firm's value: evidence from local state-owned enterprises. *Journal of Management World*, 2012, 28(8): 91–105.
- [36] REGO S O, WILSON R. Equity risk incentives and corporate tax aggressiveness.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 2012, 50(3): 775–810.
- [37] CHYZ J A. Personally tax aggressive executives and corporate tax sheltering.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2013, 56(2/3): 311–328.
- [38] GRAHAM J R, TUCKER A L. Tax shelters and corporate debt policy.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2006, 81(3): 563–594.
- [39] DESAI M A, DYCK A, ZINGALES L. Theft and taxes.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2007, 84(3): 591–623.
- [40] CROCKER K J, SLEMROD J. Corporate tax evasion with agency costs.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2005, 89(9/10): 1593–1610.
- [41] SLEMROD J. The economics of corporate tax selfishness. *National Tax Journal*, 2004, 57(4): 877–899.
- [42] BALAKRISHNAN K, BLOUIN J L, GUAY W R. Tax aggressiveness and corporate transparency. *Accounting Review*, 2019, 94(1): 45–69.
- [43] TAJFEL H. Human groups and social categories: studies in social psychology. *Cambridgeshir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126–142.
- [44] CHEN K P, CHU C Y C. Internal control versus external manipulation: a model of corporate income tax evasion. *The RAND Journal of Economics*, 2005, 36(1): 151–164.
- [45] HEALY P M, PALEPU K G. Information asymmetry, corporate disclosure, and the capital markets: a review of the empirical disclosure literature.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2001, 31(1/3): 405–440.
- [46] 孙刚. 家族企业、税收稽查治理与企业避税行为. *税务与经济*, 2012(3): 67–75.
- SUN Gang. Family business, tax inspection and governance and tax avoidance. *Taxation and Economy*, 2012(3): 67–75.
- [47] 曾亚敏, 张俊生. 税收征管能够发挥公司治理功用吗?. *管理世界*, 2009, 25(3): 143–151, 158.
- ZENG Yamin, ZHANG Junsheng. Can the supervision of tax collection play a role in the governance of companies?. *Journal of Management World*, 2009, 25(3): 143–151, 158.
- [48] CHEN S P, CHEN X, CHENG Q, et al. Are family firms more tax aggressive than non-family firms?.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2010, 95(1): 41–61.
- [49] 后青松, 袁建国, 张鹏. 企业避税行为影响其银行债务契约吗: 基于A股上市公司的考察. *南开管理评论*, 2016, 19(4): 122–134.
- HOU Qingsong, YUAN Jianguo, ZHANG Peng. Does corporate tax avoidance behavior affect bank debt covenants? An empirical research using China's listed company data. *Nankai Business Review*, 2016, 19(4): 122–134.
- [50] BHARATH S T, SUNDER J, SUNDER S V. Accounting quality and debt contracting. *The Accounting Review*, 2008, 83(1): 1–28.
- [51] KOTHARI S P, LEONE A J, WASLEY C E. Performance matched discretionary accrual measures.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2005, 39(1): 163–197.

## CEO Organizational Identification and Tax Avoidance

ZHOU Meihua<sup>1</sup>, LAN Minghui<sup>2</sup>, LIN Bin<sup>3</sup>

1 School of Accountancy, Jiangxi University of Finance & Economics, Nanchang 330013, China

2 Business School, Central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Beijing 100081, China

3 School of Management, Sun Ye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China

**Abstract:** As the direct decision-maker and executor, the psyc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senior executives would have an important impact on the behavior of enterprises. The existing research has found that senior executives have an important impact on enterprise tax avoidance policies, and there is a trade-off benefits and costs when making tax avoidance decisions, CEOs who have different sense of organizational identification have large differences in considering benefits and costs, which leads to different tax avoidance policies.

Based on the benefit and cost theory of tax avoidance and agency theory, using the organizational identification data from the survey of China's listed companies in 2014 and the difference of nominal tax rate and effective tax rate as tax avoidance measurement. 5 209 companies-year samples are selected from the listed firms in Shanghai Stock Exchanges and Shenzhen Stock Exchanges from 2013 to 2015.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CEO organizational identification and tax avoidance by using ordinary least square multivariate regression. In addition, this study also groups the samples according to internal enterprise information transparency and external tax collection and management intensity, and further examines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CEO organizational identification and tax avoidance under the different circumstances. The research method is ordinary least square multivariate regression.

The empirical results reveal that CEO organizational identification is significantly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tax avoidance, that is, the higher the CEO organizational identification, the less tax avoidance. From internal enterprise information transparency and external tax collection and management intensity, this study analyzes the different scenario how to effect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CEO organizational identification and tax avoidance. 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CEO organizational identification is significantly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tax avoidance only in the firms with higher information transparency or weaker tax collection and management intensity. In addition, this study finds that CFO organizational identification is also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tax avoidance, but not significantly, and CFO organizational identification does not affect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CEO organizational identification and tax avoidance. In robustness test, using effective tax rate instead of tax avoidance, employing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to build CEO organizational identification variable, the results still remain the same.

This study demonstrates that CEO organizational identification has an important impact on tax avoidance and the association varies under different scenarios. The findings are helpful to understand the tax avoidance behaviors of firm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Chinese system. It also has some implications for tax regulators, financial authorities and firms, and have certain guidance significance to improve the human resource plan of executives in the listed enterprise.

**Keywords:** organizational identification; tax avoidance; information transparency; tax collection and management intensity; effective tax rate

---

Received Date: January 24<sup>th</sup>, 2019      Accepted Date: October 18<sup>th</sup>, 2019

**Funded Project:** Supported by the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71862017, 71332004), the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Jiangxi Province (20181BAA208026), the Cultivating Project of Accounting Talents by Ministry of Finance of China(Finance and Accounting [2016] No.15), and the 64<sup>th</sup> China Postdoctoral Science Foundation (2018M642587)

**Biography:** ZHOU Meihua, doctor in management, is an associate professor in the School of Accountancy at Jiangxi University of Finance & Economics. His research interest focuses on accounting and finance based on organization behavior. His representative paper titled "Does CEO organizational identification mitigate earnings management? Evidence from the questionnaires of listed companies in China" was published in the *Nankai Business Review* (Issue 4, 2018). E-mail: [zhoumh\\_sysbs@126.com](mailto:zhoumh_sysbs@126.com)

LAN Minghui is a Ph.D candidate in the Business School at Central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Her research interests include corporate finance and accounting. E-mail: [minghuilan@126.com](mailto:minghuilan@126.com)

LIN Bin, doctor in economics, is a professor in the School of Management at Sun Yet-sen University. His research interest focuses on internal control. His representative paper titled "Research of internal control index based on information disclosure" was published in the *Accounting Research* (Issue 12, 2016). E-mail: [mnslb@126.com](mailto:mnslb@126.com)

